

# 1870 ~ 2002 年全球 Palmar 干旱指数集 ——PDSI 与土壤湿度及地表增温效应的关系

AIGUO DAI, KEVIB E, TAOTAO QIAN

王涓力 译

(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,甘肃省干旱气候变化与减灾重点实验室,甘肃 兰州 730020)

**摘要:**用历史降水和温度资料得到全球陆地区域(分辨率为 $2.5^\circ \times 2.5^\circ$ )1870~2002年间的月Palmar干旱指数(PDSI)。伊利诺斯州、蒙古及中国与前苏联部分地区有土壤湿度资料,暖季的PDSI与实测土壤湿度(土层厚度为1 m)呈显著相关( $r = 0.5 \sim 0.7$ ),夏末和秋季相关最好,而春季由于融雪的影响相关最差。对世界最长河流(其中7条)及几条其他河流进行分析,各流域平均的年PDSI变化与径流相关很好( $r = 0.6 \sim 0.8$ ),表明PDSI可以很好地表征地表土壤湿度状况与径流。对PDSI进行经验正交函数(EOF)分析,揭示了由降水、温度趋势及ENSO引起的年际内变率所产生的线性趋势。全球严重干旱区( $PDSI < -3.0$ )面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增加了1倍多,其中80年代初由于ENSO引起的降水减少造成干旱区面积的突增,后来的增加主要归因于地表增温;全球非常湿润区( $PDSI > +3.0$ )面积80年代减少不明显。自1972年以来,全球极干或极湿地区面积从20%增加到了38%,80年代中期以后地表增温是其主要原因。这些结果为日益增加的干旱风险提供了观测证据,干旱风险的增加是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结果。

## 前 言

干旱和洪涝是极端气候事件,是代价最昂贵的自然灾害之一,每年都影响为数众多的人群(Wilhite, 2000),所以监测干旱与洪涝及预测其变化非常重要。在全球变暖背景下,这些极端气候事件有很大的潜在增加趋势,应特别关注(Trenberth, 2004)。然而,干旱与湿涝很难精确量化,因为存在许多不同的定义(如有气象、水文与农业干旱,见Wilhite 2000; Keyantash 和 Dracup 2002),并且确定一次干旱或湿涝事件开始与结束的标准也不同,此外也缺乏地面干湿状况的历史观测记录(Robock et al 2000)。为监测干旱与湿涝,研究其变率,定义了很多专门的指数(Hiem 2000; Keyantash, Dracup 2002)。其中Palmer干旱指数(PDSI)是美国气象干旱中使用最重要的指数(Heim 2002),其目的是测量大气水分供给及地表水分需求相对于当地

平均状态的累积距平。它将前期降水、水分供给及水分需求并入一个水文收支系统中,在计算土壤水分时用了一个2层水桶模式,并基于美国中部有限的资料对田间水容量及2层间的水分传输做了某些条件假设(Palmer 1965; Heim 2002)。作为PDSI计算的中间项,Palmer模式也计算出了Palmer水分异常指数(Z指数),它反映当前月的地表水分异常,未考虑前期条件。Z指数能迅速反映土壤水分变化(Karl 1986),可追踪农业干旱,它与PDSI通过下面方程相联系(Palmer 1965):  $PDSI(m) = PDSI(m-1) + [Z(m)/3 - 0.103 PDSI(m-1)]$ , 式中m是一个月指数。有关Palmer模式在Palmer(1965), Alley(1984)及Karl(1986)的文章中都有详细描述。

理论上讲,PDSI是一个标准化量,其值范围在-10(干)~+10(湿)之间,在空间和时间上具有可比性。然而,Guttman等(1992)发现,在通常的气候

条件下大平原地区的 PDSI 比美国其他地区倾向于更严重。PDSI 把所有降水处理成直接有效降水(即地面没有雪的堆积)也是不精确的,还有植被对地表蒸散的影响,校准系数(Karl 1986)及一些其他过程(Aelly, 1984)也有影响。例如, Palmer 假设当土壤顶层所有有效水分消耗殆尽才有潜在蒸散存在,只有到那时土壤下层的水分才会散失。尽管这些假设是合理的,它们也仅仅是对裸地的粗略近似(Philip 1975)。Palmer 模式中,对由于云量及气溶胶浓度变化所引起的地表太阳辐射变化(Abakumova 等 1996; Liepert 2002)等一些因子没有明确地考虑,虽然太阳辐射毫无疑问在影响地表温度。同样,PDSI 在土地冻结、积雪及融雪状态时也不能反映土壤湿度状况,如中高纬度的冬、春季节。尽管如此,在这些状态下 PDSI 仍然是水分供需累积效应(即气象干旱)的一个近似度量。尽管我们认为 PDSI 在暖季确实与土壤水分含量相关,但是也强调 PDSI 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土壤水分估算量,对农业干旱也是如此。

相比于其他许多只基于降水的干旱指数而言,PDSI 用降水和地表气温作为输入值,是值得肯定的( Keyantash, Dracup 2002),这使 PDSI 揭示了 20 世纪已经发生的全球变暖对干旱与湿涝的基本影响。地表温度对 PDSI 的影响来自潜在蒸散项,占其变率的 10%~30%,潜在蒸散在 Palmer 模式中用 Thornthwaite 的公式(1948)计算而得,作为大气对水分需求的度量。由于降水与地表气温只是 2 个气候变量,并有很长的历史记录,对绝大多数陆地区域而言,能够容易地计算出最近 100 a 左右的 PDSI 值。

PDSI 在美国除用于常规干旱监测外,美国(例如:Karl, Koscielny 1982; Karl 1986)、欧洲(Domonkos 等 2001; Lloyd - Hughes, Saunders 2002)、非洲(Ntale, Gan 2003)、巴西(dos Santos, Pereira 1999)

及其他地区也用来研究干旱气候及干旱气候变异,PDSI 也用于树轮重建美国干旱的研究(如:Cole, Cook 1998; Cook 等 1999; Fye 等 2003)。这些研究大多是区域性的或集中在特定区域及国家。Dai 等(1998)计算了全球陆地区域 1900~1995 年间的 PDSI 并分析了 ENSO 对全球干、湿地区的影响。本项工作修正了 Dai 等 1998 年建立的全球 PDSI 数据集,提供了详细的 PDSI 与有效土壤湿度及河川径流资料的对照,分析了 20 世纪 PDSI 领域变化的趋势和最新模式,研究了 20 世纪下半叶地表增温对全球干、湿地区的影响。全球 PDSI 数据集(<http://www.cgd.ucar.edu/cas/catalog/climind/pdsi.html>)已经被很多研究机构使用,并且将来会定期更新。我们强调 PDSI 用于年际尺度较好,不适宜作为高纬地区冷季土壤水分含量的度量。另外,对于给定的 PDSI 值来定量解释干燥或湿润要取决于当地的平均气候状况,如 PDSI 值为 +4,在美国中部可能意味着洪涝,而在北非则只是中度降水(以美国中部标准而言)。

## 1 资料及方法

表 1 列出了用于本项研究的资料。地表气温资料(Jones, Moberg 2003)来自 CRU; 1948~2003 年的降水资料取自 NCEP 气候预测中心(Chen 等 2002),其中 1948~1997 年由来自 5 000~16 500 个雨量站的格点资料创建,近些年由 3 500 个雨量站的资料采用最佳内插方案得到,1948 年以前来自 Dai 等(1997)的降水资料。Dai 等的降水逐月距平在 1950~1979 年间调整为有零平均值,然后加上 Chen 等(2002)1950~1979 年的平均值,从而获得用于 PDSI 计算的总降水。田间水容量(*awc*),来自 Webb 等(1993)的基于土壤结构的水容量图,如果 *awc* ≤ 2.54 cm, 则 *awc* 被赋值为土壤表层水容

表 1 本项研究所用资料(逐月资料)

变 量	类型及区域	分 辨 率	时 段	来 源 及 参 考 文 章
<i>P</i>	雨量站, 陆地	2.5° × 2.5°	1850~2003	Dai 等(1997); Chen 等(2002)
<i>T</i>	地面观测, 陆地	5° × 5°	1851~2003	CRUTEM2; Jones, Moberg(2003)
径流量	测站, 陆地			NCAR; Dai, Trenberth 2002
土壤湿度	测站, 陆地		10~21 a	Robock 等(2000)
	伊利诺斯州	19 个测站	1981~2001	Hollinger, Isard(1994)
	中国	43 个测站	1981~1991	Robock 等(2000)
	蒙古	42 个测站	1978~1993	Robock 等(2000)
	前苏联	50 个测站	1972~1985	Vinnikov, Yeserkepova(1991)
土壤水容量	推导出, 陆地	1° × 1°	气候尺度	Webb 等(1993)

量, 底层水容量为零;  $awc > 2.54 \text{ cm}$ , 则顶层水容量为  $2.54 \text{ cm}$ , 底层为( $awc - 2.54$ )  $\text{cm}$ 。温度与降水资源很可能存在误差,但在以前的工作中(例如: Jones, Moberg 2003; Dai 等 1997; Chen 等 2002)对各种资料已进行过误差的最小化,时间序列在大多数陆地区域认为是可信的。相对较低的分辨率( $2.5^\circ \times 2.5^\circ$ )不能解决诸如山区等小尺度的变化。

由于同任何观测量如土壤湿度和径流量没有直接的可比性,使用 PDSI 时通常没有经过严格的评价。土壤湿度反映地表径流过后下垫面保留的降水量,取决于诸多因素,包括田间水容量(土壤结构与土层厚度的函数)、前期土壤状况、降水频次及强度(Trenberth 等 2003)。例如,一次大暴雨会产生大的地表径流甚至引发洪水,但是次地表土壤可能还是干的;相反,数小时的持续小雨会彻底浸湿土壤而不会有地表径流。此外地表与次地表径流可能数周或数月后才能到达大河流的下游。这些说明了大气水分供需(计算 PDSI 所需)、土壤湿度、地表径流与河流径流量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。不过,从区域或流域尺度和年平均而言,PDSI、土壤湿度及河流径流量应彼此相关,因为它们都是区域性大气水分供给(即降水)及需求(即蒸散)所驱动的大尺度干旱与湿涝的度量因子。Dai 等(1998)研究表明,美国、加拿大的中纬地区、欧洲及澳大利亚东南部区域平均的 PDSI 与 20 世纪的河流径流量显著相关( $r = 0.63 \sim 0.75$ )。本研究比较了伊利诺斯州、蒙古、中国及前苏联部分地区的 PDSI 与来自全球土壤湿度资料库([http://climate.envsci.rutgers.edu/soil\\_moisture/](http://climate.envsci.rutgers.edu/soil_moisture/))的有效土壤湿度(Robock 等,2000)。土壤湿度测站按照经纬度分区以便同格点化的 PDSI

值进行比较,首先对附近测站资料进行平均,然后结合其他测站以获得该区的方位平均值。同时,对很多大流域的 PDSI 与实测的 20 世纪河流径流量(来自 Dai 和 Trenberth,2002)相比较,在比较中,以年时间序列为主,忽略局地地表径流与下游河流径流量之间的时间滞后。PDSI 与其他干旱因子之间的显著相关为 PDSI 数据集的使用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。

## 2 PDSI 与土壤湿度

图 1 是伊利诺斯州土壤湿度实测值与 Palmer 模式的计算值比较。夏半年,Palmer 模式的计算值(土层厚度 0.9 m)在季节性及年变率平均上仅存在很小的偏差,考虑到相比于现在的陆面模式(如 Dai 等 2003),Palmer 模式仅受逐月气温与降水影响,因此这一结果是值得注意的。最大的偏差出现在 9 月,计算的平均土壤湿度比实测值低,而年际内土壤湿度距平比实测值大,但并不影响相关性。计算的总土壤湿度与实测的每层土壤湿度相关最好,9 月与 1.25 m 土层厚度的实测值显著相关,3~4 月相关不显著,5~6 月仅与 0.5 m 土层厚度实测值显著相关(图 1c)。春季低相关不足为奇,因为在简单的 Palmer 模式中没有考虑融雪,但是在伊利诺斯州它对土壤湿度有很大的影响。5~6 月,融雪的影响逐渐消失,土壤湿度受月降水的影响逐渐增大,于是 Palmer 模式模拟得较好。此外,图 1b 表明 Palmer 模式及实测资料中的土壤水分距平有不同的下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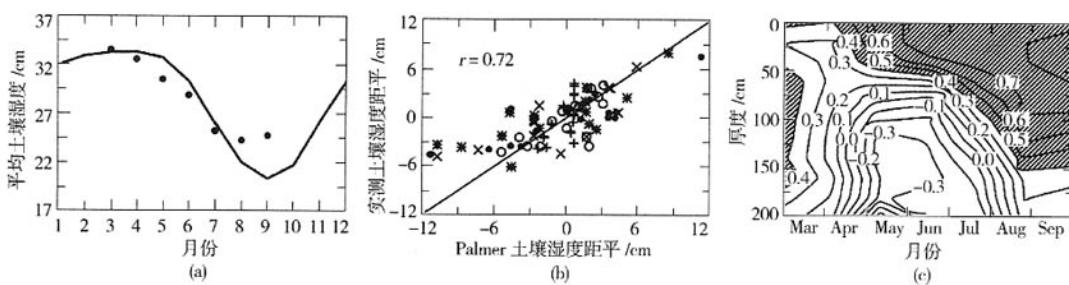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 (a) 伊利诺斯州平均土壤湿度 Palmer 模式计算值(实线)与实测值(点, 土层厚度为 0.9 m, 17 个站);  
(b) 1981~2001 年伊利诺斯州月土壤湿度距平 Palmer 模式计算值与实测值, 符号 +, ○, ×, \*, · 分别代表 5, 6, 7, 8, 9 月;  
(c) 作为月与土层厚度函数的土壤湿度实测值与 Palmer 计算值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布,  
 $<0.4$  的值为统计不显著, 10~2 月土壤湿度资料缺失

伊利诺斯州实测土壤湿度与 PDSI 也存在显著相关(图2)。由于图中3个右下方的点,年际内相关大大

减弱,并且与每层土壤湿度的相关性也比图1c 中显示的小,而5月 PDSI 与实测土壤湿度相关最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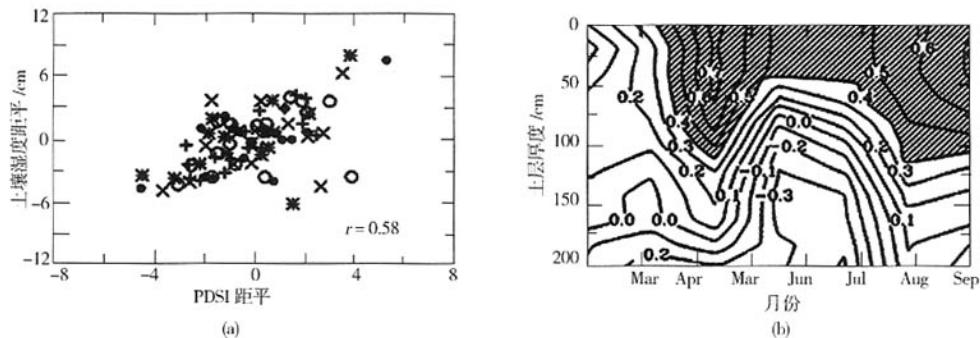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2 (a)1981~2001年伊利诺斯州 PDSI 月距平与0.9 m土层厚度实测土壤湿度距平。所有点的相关系数 $r=0.58$ , 符号+、○、×、\*、·分别代表5、6、7、8、9月;(b)作为月与土层厚度函数的土壤湿度实测值与PDSI 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布,<0.4的值为统计不显著,10~2月土壤湿度资料缺失

由于 Palmer 模式是针对美国中部地区设计的,用该模式计算的土壤湿度在中国、蒙古及前苏联的很多地区有很大偏差。而 PDSI 与 Z 指数是标准化指

数,其偏差很小,因此美国以外的地区只对 PDSI, Z 指数与实测土壤湿度进行比较。

表2 给出实测月平均土壤湿度(土层厚度1 m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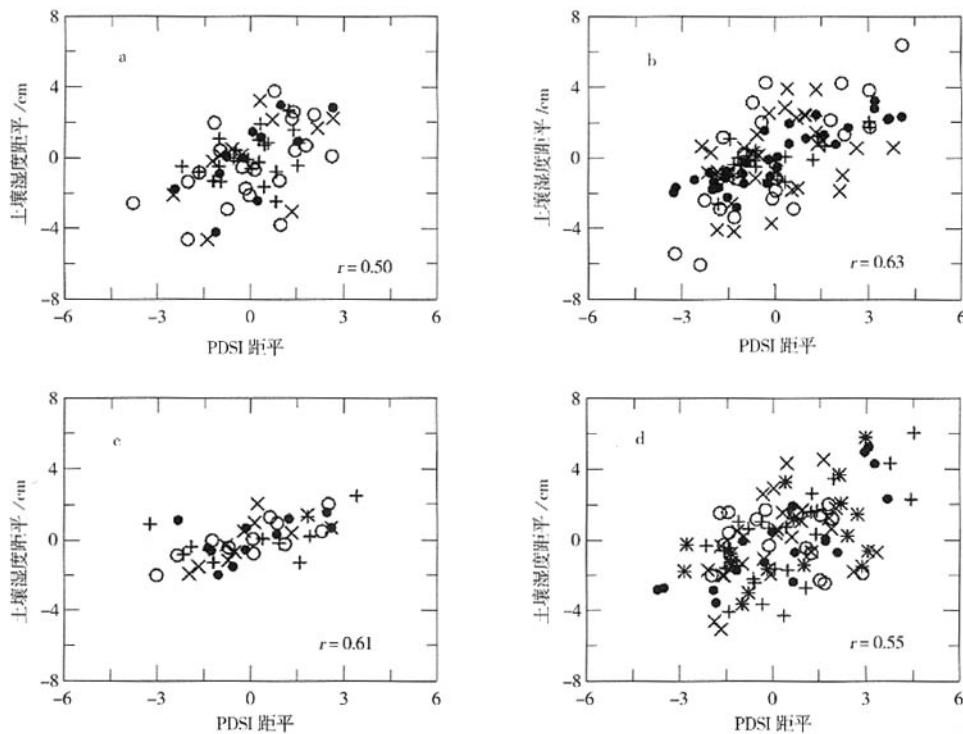


图3 中国区域1981~1991年PDSI月距平与实测土壤湿度距平(土层厚度1 m,图3c为0.5 m)。 $r$ 是相关系数。(a)中国东北(14个测站);(b)中国东部(7个测站);(c)华北(5个测站);(d)中国南部(3个测站)。符号+、○、×、·分别表示(a)6、7~8、9、10月;(b)3~4、5~6、7~9、8月;(c)5、6、7、8月;(d)1~3、4~5、6~8、11~12月,\*代表9~10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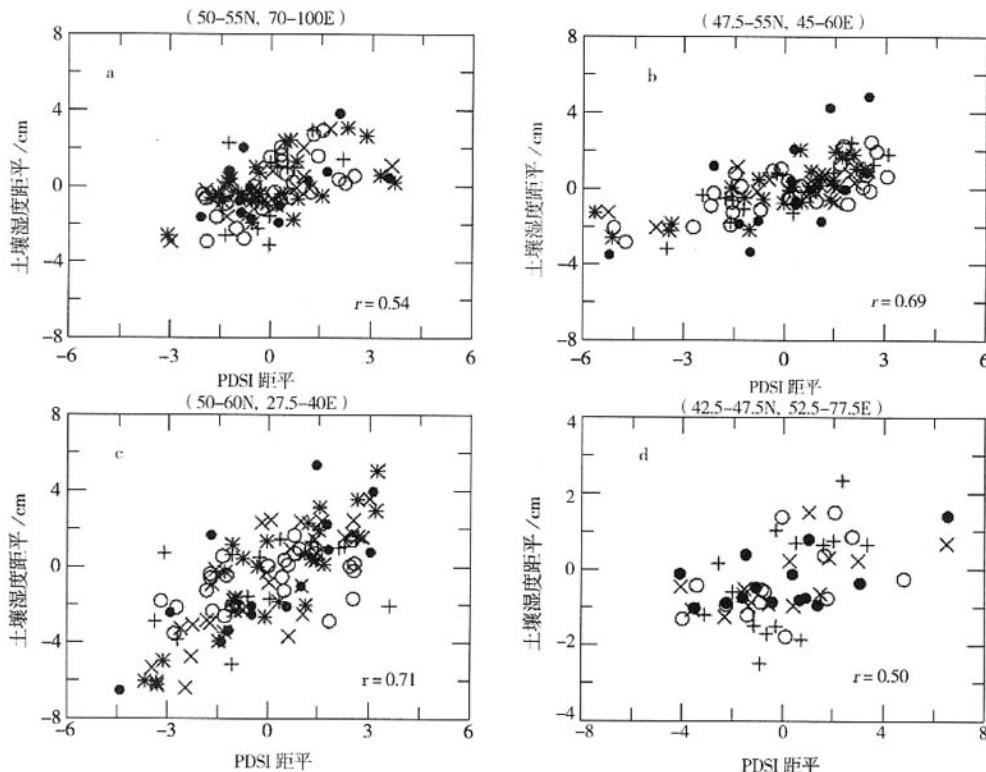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4 前苏联 4 个地区 1972~1985 年 PDSI 月距平与实测土壤湿度距平。(a)1 区(11 个测站),(b)2 区(14 个测站),(c)3 区(8 个测站),(d)4 区(9 个测站)。符号 +, O, x, \*, · 分别表示 4, 5~6, 7, 8~9, 10 月(a);5, 6~7, 8, 9~10, 11 月(b);4, 5~6, 7~8, 9~10, 11 月(c);+, O, x, · 为 4, 5, 6, 7 月(d)

伊利诺斯州为 0.9 m) 与 Palmer 模式计算的土壤湿度, Z 指数, PDSI 及实测降水量之间的相关系数(Robock 等, 2000)。图 3, 图 4 分别是中国及前苏联区域的 PDSI 与实测土壤湿度的对比。除了很少下雪的中国南部地区外, 考虑相关时排除了绝大多数冬、春月, 一是由于土壤湿度资料不全, 二是雪对土壤湿度与 PDSI 及 Z 指数关系的影响。在这些月资料的比较中, 只考虑同步相关。表 2, 图 2 及图 4 表明, 相比于模式计算的土壤湿度, Z 指数以及实测降水量、实测土壤湿度始终与 PDSI 相关更好, 其相关系数在 0.5~0.7 之间。由于 Z 指数与降水量的时间序列相比于 PDSI 有更高频率的变化, 实测土壤湿度与它们的相关一般较低。土壤湿度实测值与模式计算值之间的相关比 Z 指数要好, 但它在美国中部地区之外可能

存在大的平均偏差。图 2a, 3 及 4 给出了实测土壤湿度与 PDSI 之间的定量关系, 看出在大多数地区没有随月份的显著变化, 而中国东部 10~12 月时段 PDSI 随土壤湿度变化比其他月份大。

如前面所述, Palmer 模式没有考虑雪及其他影响土壤湿度的过程, 因此 PDSI 不是土壤湿度的直接度量, 两者的相关也不能期望非常理想。另外, 每月仅有 2~3 次的土壤湿度观测, 有许多缺测, 很可能存在大的时空样本误差, 特别在诸如中国南部及蒙古西部等测站稀疏地区(表 2), 图 1b, 2a, 3 及 4 中的离散点对这些误差也有所反映。美国之外的土壤湿度记录相对较短导致每月每层土壤湿度与 PDSI 的相关存在噪声, 不过, 在大多数地区, 1 m 土层厚度的土壤湿度与 PDSI 相关。

表2 实测土壤湿度(SM, 土层厚度1 m)与Palmer模式计算的土壤湿度(PSM), 水分异常指数(Z), PDSI, 及实测降水量(P)之间的相关系数。加黑数据通过 $\alpha = 0.05$ 的显著性检验, 资料时段见表1

区域(测站数)	SM与PSM	SM与Z	SM与PDSI	SM与P	时段
伊利诺斯州(17)	<b>0.72</b>	<b>0.72</b>	<b>0.58</b>	<b>0.64</b>	5~9月
中国东北(14) (40°~47.5°N, 122.5°~132.5°E)	<b>0.50</b>	0.24	<b>0.50</b>	0.16	5~10月
中国东部(7) (32.5°~35°N, 110°~120°E)	<b>0.58</b>	<b>0.51</b>	<b>0.63</b>	<b>0.39</b>	3~12月
中国北部(5) (35°~42.5°N, 105°~110°E)	<b>0.44</b>	0.33	<b>0.61</b>	0.31	5~8月
中国南部(3) (22.5°~25°N, 102.5°~110°E)	<b>0.45</b>	<b>0.36</b>	<b>0.55</b>	0.23	1~12月
蒙古西部(7) (45°~50°N, 90°~97.5°E)	<b>0.44</b>	<b>0.49</b>	<b>0.50</b>	<b>0.42</b>	1~10月
蒙古中部(25) (45°~50°N, 97.5°~107.5°E)	<b>0.42</b>	<b>0.33</b>	<b>0.52</b>	<b>0.33</b>	5~9月
蒙古东部(6) 45°~50°N, 110°~115°E	0.29	<b>0.40</b>	<b>0.48</b>	<b>0.38</b>	5~9月
前苏联1区(11) (50°~55°N, 70°~100°E)	<b>0.45</b>	<b>0.42</b>	<b>0.54</b>	<b>0.34</b>	4~1月
前苏联2区(14) (47.5°~55°N, 45°~60°E)	<b>0.67</b>	<b>0.59</b>	<b>0.69</b>	<b>0.45</b>	5~11月
前苏联3区(8) (50°~60°N, 27.5°~40°E)	0.77	<b>0.57</b>	<b>0.71</b>	<b>0.38</b>	4~11月
前苏联4区(9) (42.5°~47.5°N, 52.5°~77.5°E)	<b>0.42</b>	<b>0.58</b>	<b>0.50</b>	<b>0.57</b>	4~7月

### 3 PDSI与河流径流量

对世界最大河流中的8条(雅鲁藏布江和湄公河由于流量记录太短而没有考虑)及4条有较长记录的河流的年径流量和流域平均的PDSI的时间序列进行了对比(图5)。获取流域平均的PDSI时, 需要流域一半以上的地区要有资料, 这就影响了时间序列中较早年份的PDSI值。图5显示除Yenisey河之外, 流域平均的PDSI普遍随河流径流量变化。如亚马逊河流域的PDSI在最近的30 a中紧随Obidos测站的流量变化, 由此可推出20世纪60年代亚马逊河流量小而50年代接近正常流量, 并与40年代的实测径流量符合。对于奥利诺科河、密西西比河、Paraná河而言, PDSI与径流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都有所增加。对于刚果河流域, 1960年左右PDSI与径流出现大幅增加, 随后又逐渐减少。甚至对于较小的一些流域, 如美国和加拿大西部的哥伦比亚河、美国东北的Susquehanna河及瑞典的Göta河流域, PDSI与河流径流量的变化都很接近, 两者

都存在大幅多年变率及干、湿年代的快速转换。对于大多数河流, 实测的年径流量与流域平均的年PDSI之间的相关系数与径流量和流域平均降水量(从前冬季到当年秋季)之间的相关系数差不多。甚至对于融雪量很大的流域, 如哥伦比亚河及勒那河流域, PDSI与年径流量相关的原因是冬、春季的降雪增加了冬春及随后几个月的PDSI值, 导致了年尺度上的相关。

Yenisey河流域PDSI与径流量的相关较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流域1960~2000年期间降水变化很小而温度增加了2℃, 大幅增温使得PDSI呈下降趋势。而该流域雨量站的相对稀少(Chen等, 2002), 可能导致了径流量和流域平均的降水量之间的低相关( $r = 0.24$ )。工农业用水减小了流量, 大的水坝建设极大地改变了河流的年度循环(Yang等, 2004), 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Yenisey河流量呈上升趋势的原因尚无法解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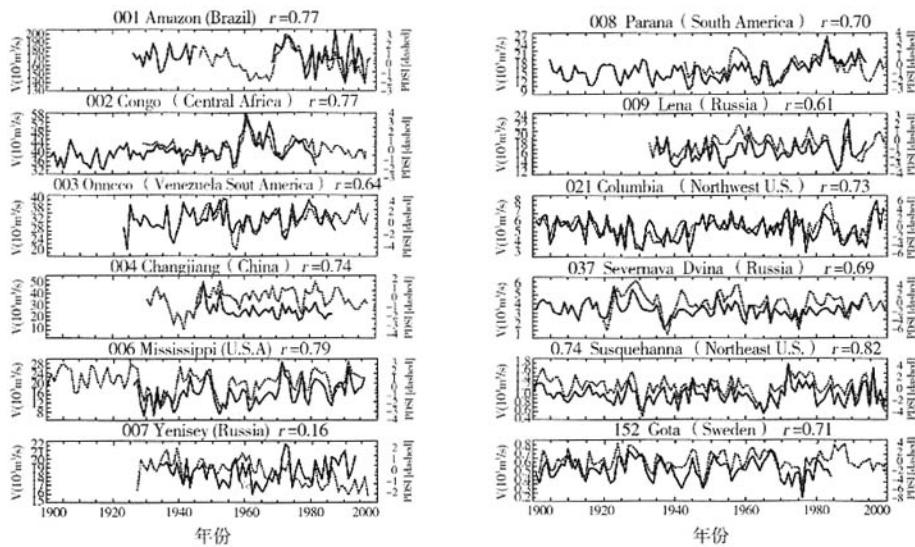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5 流域平均的年 PDSI(点线)与最下游测站实测年径流量(单位: $10^3 \text{ m}^3 \text{s}^{-1}$ , 实线)对比  
(10 大河流中的 8 条及 4 条有较长记录的河流)

#### 4 全球 PDSI 的分布型

图 6 是 1900~2002 年逐月 PDSI 相关矩阵经验正交函数分解的前 2 个模态的时空分布型。陆地区域(除格林兰, 南极洲外)1948 年以后都有资料, 这满足我们 EOF 分析需要的资料年限最少为 50 a 的条件。由 EOFs 解释的方差百分率与陆地降水 EOFs 的方差百分率(Dai 等 1997)相当。第 1 经验

正交函数的主成分时间序列呈现线性趋势, 表明非洲北部、南部, 中东地区, 蒙古, 澳大利亚东部在变干; 美国、阿根廷及欧亚大陆部分地区在变湿。Dai 等(1997)通过 EOF 分析给出全球陆地降水在 1900~1988 年期间的线性增加趋势, 其中美国、阿根廷及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有大幅增加。降水增加的湿润效应被 20 世纪很多地区地表增暖的变干效应缓解, 导致了如图 6 所示的区域性变干和变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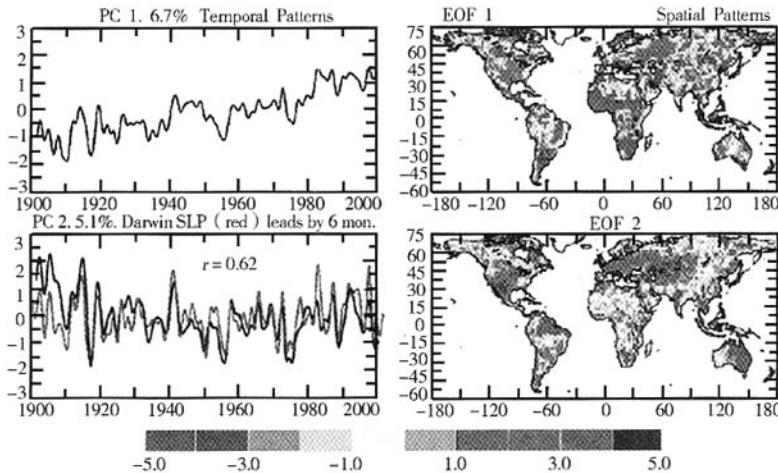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6 逐月 PDSI(在 EOF 分析前用标准偏差进行了标准化)EOF 第 1,2 模态的时间(左, 黑色线)  
及空间(右)分布型。左下图中细线是向右漂移 6 个月的 Darwin 平均  
海平面气压, 最大相关系数  $r = 0.62$ . 左图中  $<2 \text{ a}$  尺度的变异被滤除, 左图顶给出解释方差百分率

PDSI 的第 2 经验正交函数揭示了与 ENSO 高相关的时空分布型, 表明 PDSI 的多年变异主要与 ENSO 有关, 因此代表了气候系统的真实模态, 与 ENSO 相关的降水异常主要导致这种分布型(如 Ropelewski, Halpert 1987; Dai, Wigley 2000; Trenberth, Caron 2000), 而 ENSO 引起的温度异常影响却很小(Kiladis, Diaz 1989)。图 6 中的滞后相关表明 ENSO 对陆地区域的最大影响滞后于热带太平洋 ENSO 指数约 6 个月, 这种时间上的滞后, 部分是由于不可忽视的土壤水分记忆。ENSO 的 EOF 分析表明在 El Niño 期间, 北美(除阿拉斯加之外)、欧洲、中亚、南美南部的大多数地区比正常年份偏湿, 但澳大利亚东部、南美北部及南亚地区较正常年份偏干; 在 La Niña 期间, 这些异常则刚好反过来。这一线性结果仅是一阶近似, 因为在 ENSO 的冷暖态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现象(如 Monahan, Dai 2004)。

## 5 PDSI 趋势及全球干湿地区

图 7(上)、(中)给出逐月资料计算的 1900~1949 及 1950~2002 年期间 PDSI 的线性趋势。在 20 世纪上半叶, 几内亚海岸、非洲南部、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及欧洲中部与南部变得较干, 而亚洲大多数地区、阿拉斯加及南美洲部分地区由于降水增加, 地表增温相对较小而变得较湿。自 1950 年以来, 阿根廷、美国南部及澳大利亚西部的大多数地区降水显著增加, 使这些地区变得湿润起来。然而, 1950~2002 年期间, 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、非洲、加拿大、阿拉斯加及澳大利亚东部在变干, 并且 1950 年以后, 这些地区增温明显(图 8), 地表增温是这些地区发生大范围干旱的主要原因。如果没有增温影响, PDSI 的减小会小得多, 也不会涉及那么多地区, 如图 7(下)所示。事实上, 20 世纪末期的增温导致绝大多数陆地区域的 PDSI 减小了 0.5~1.5(图 8), 考虑到 Palmer 将 PDSI < -0.5 分类为干或干旱状态(1965), 则这样的减小是非常显著的, 而中亚与加拿大变干最明显, 那里的地表气温自 1950 年以来上升了 1.5~2.0 °C(图 8)。由于降水减少及温度增加(图 7, 8), 中东干旱区及萨赫尔自 1950 年以后也严重变干。

分析 PDSI 夏季与冬季的趋势, 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很小, 即使在 1950~2002 年期间北半球中高纬地区冬季增温比夏季大得多(冬季:1.5~4.0 °C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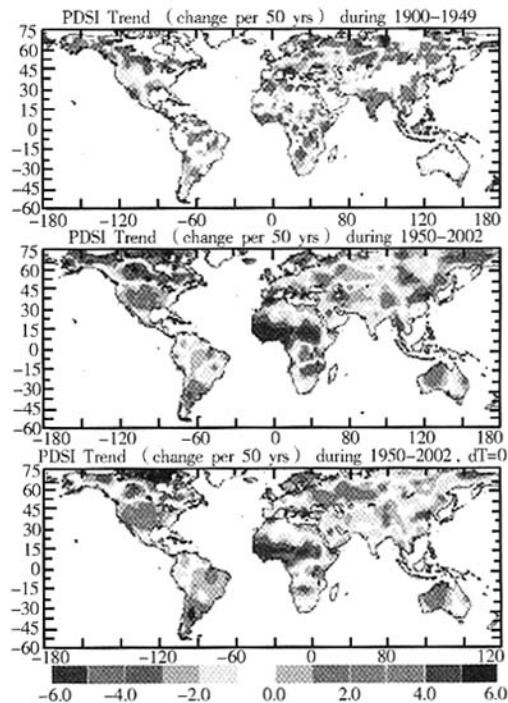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7 1900~1949 年(上)、1950~2002 年(中)  
PDSI 的线性趋势(每 50 a 的变化, 用温度和降水量计算),  
(下)1950~2002 年的 PDSI 趋势(没有考虑温度变化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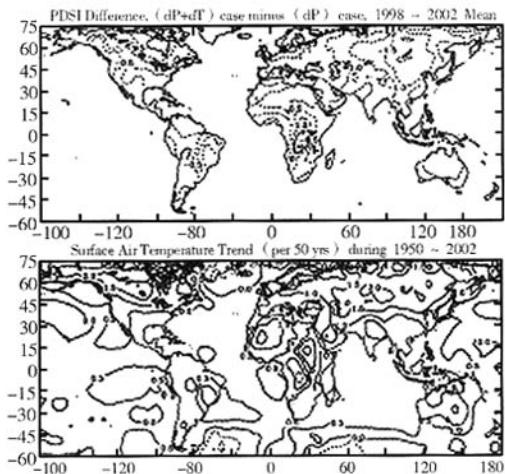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8 (上) 1998~2002 年间用温度和降水量变化计算的  
PDSI 与不考虑温度变化的 PDSI 平均差;(下)1950~2002 年  
间实测地表气温的线性趋势(°C/50 a), 虚线包围中有负值

夏季:0.5~1.5℃)的情况下。这有2方面的原因,首先,由于饱和水汽压对温度的非线性依赖,对于给定的温度增幅,潜在蒸散(即大气水分需求)增加夏季要比冬季大很多;其次,PDSI有相当长的记忆,部分地反映了土壤水分的记忆,冬春季的地表增温依然能影响夏季的PDSI。

1950年后,除南极洲和格陵兰外,所有陆地区域的PDSI值都可得到,这就使我们对1950~2002年期间极端干旱(PDSI<-3.0)、过度湿润(PDSI>3.0)以及过干或过湿地区的面积百分率进行可靠地估计。图9表明,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,极干旱地区已经增加了一倍多(从12%增加到30%),80年代初期由于降水减少引起其面积大幅增加,随后主要是地表增温的影响。80年代初的降水减少主要发生在ENSO敏感地区,如萨赫尔、非洲南部及东亚地区,El Niños现象导致这些地区雨水减少(Dai等1997; Dai, Wigley 2000)。相反,地表增暖引起的变干现象发生在绝大多数陆地区域,北半球中高纬地区最明显(图8)。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极干旱地区的增加相一致,全球过度湿润地区面积下降

了5%,降水减少是主要原因,之后增温起了主要作用。1950~1972年间,全球极干或极湿地区的面积减少了7%,主要是因为降水的变化。自1972年以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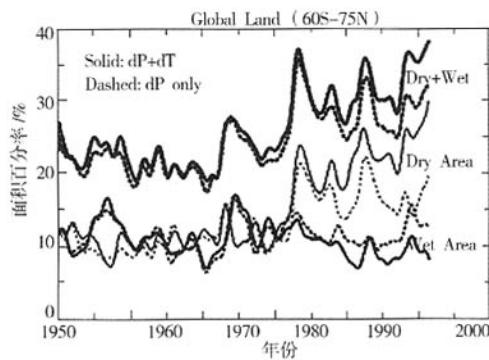


图9 1950~2002年期间60°S~75°N区域  
在极干(PDSI<-3.0, 细线)、极湿(PDSI>+3.0, 中细线)  
以及极湿或极干(顶部粗线)状态下陆地面积百分率的平滑时间序列。  
实线基于用降水及温度变化资料计算的PDSI,  
虚线没有温度变化因子(即只由降水变化引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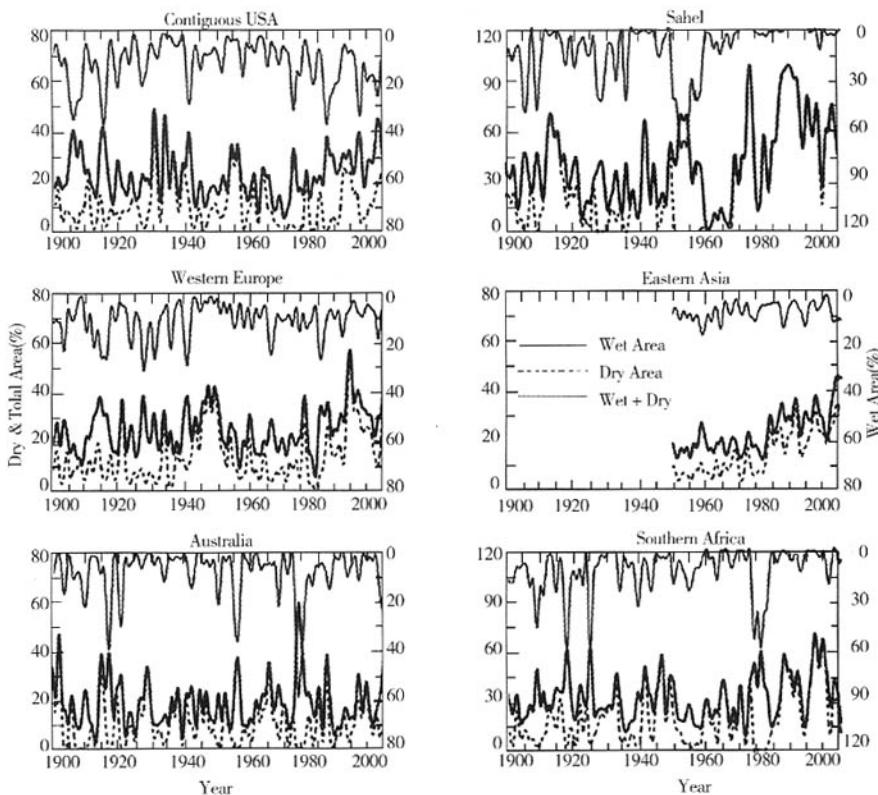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0 极干(PDSI<-3.0, 点线)、极湿(PDSI>+3.0, 图中上部实线)、  
极干或极湿(粗实线)地区面积百分率的平滑时间序列。右边纵坐标表示极湿区面积百分率,  
左纵坐标表示极干区、极干与极湿区面积百分率

来,极干和极湿地区面积已经从20%增加到38%,80年代中期后主要是增温引起的(图9)。

极干与极湿地区面积的变化随区域而不同(图10)。例如,美国本土的降水增加(Karl, Knight 1998; Groisman等2004)导致1970年后湿润地区面积增大,而20世纪30年代沙尘暴期间,极干旱地区面积增加了1倍,80年代中期后则一直保持在正常偏上,极干与极湿地区面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呈持续上升趋势;欧洲西部( $30^{\circ}\text{E}$ 以西),极湿地区面积在最近的50 a间相对稳定,而极干旱地区面积自70年代以来明显增加;在澳大利亚,干、湿地区面积的年际内变化与ENSO事件有关(如在1965~1966年,1982~1983年),而大陆尺度上的长期变化趋势则很小,即使与ENSO事件有关的2002~2003年的干旱创了记录,但干旱的严重程度部分与地表的增温有关(Nicholls 2004);萨赫尔与非洲南部,ENSO对干、湿地区面积的影响也很大,并且自1970s以来两地都变得相当干;东亚( $90^{\circ}\text{E}$ 以东)极干旱地区面积从1970s的10%增加到2000年的30%(图10)。在萨赫尔,一半以上地区呈干旱状态( $\text{PDSI} < -3.0$ ),并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,基本上已没有湿润地区,这与萨赫尔降水资料的分析是一致的(如Dai等2004)。

## 6 总结及讨论

利用月降水和地表气温资料得到全球陆地区域(分辨率为 $2.5^{\circ} \times 2.5^{\circ}$ ,南极洲与格林兰除外)1870~2002年期间的月PDSI数据。将PDSI与伊利诺斯州及欧亚大陆暖季的土壤湿度进行了比较,并与世界数条河流的径流量进行了对比。通过比较有、无温度变化时的PDSI,研究了地表增温对干旱区、湿润区的影响。

Palmer模式对伊利诺斯州土壤湿度(土层厚度为1 m)的季节性与年际内变化模拟很好,但对于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则存在很大偏差。PDSI的变化与暖季实测土壤湿度(土层厚度为1 m)的变化相关( $r = 0.5 \sim 0.7$ ),夏末及秋季相关最好,春季由于Palmer模式没有解决融雪的影响而相关最差。PDSI与土壤湿度的相关要比与降水量的相关好,表明PDSI比单独的降水量更能代表地表湿度状况。

对世界最大河流中的8条及其他几条河流流域平均的年PDSI与年径流量的相关进行了分析( $r = 0.6 \sim 0.8$ ),表明当年平均径流量资料缺失时,PDSI可以用作替代。在一些流域,如刚果河、哥伦比亚河及Göta河流域,PDSI与径流量经历了干、湿年代的快速转换。对于Orinoco河、密西西比河及Paraná河流域,近40 a两者都呈现出上升趋势。结果表明PDSI与土壤湿度及河流径流量之间的强相关,在年尺度上部分地反映了农业干旱与水文干旱之间的相关。

PDSI的EOF分析揭示了1900~2002年期间由降水和地表气温变化引起的线性趋势,非洲北部、南部,中东,蒙古,澳大利亚东部在变干;美国、阿根廷及欧亚大陆部分地区在变湿。PDSI的第2经验正交函数反映了主要由降水异常引起的与ENSO之间6个月的时间滞后。

1900~1949年间的PDSI趋势显示几内亚海岸、非洲南部、加拿大部分地区、欧洲中南部在变干,而亚洲大多数地区、阿拉斯加及南美洲部分地区在变湿。1950~2002年期间,阿根廷、美国南部、澳大利亚西部许多地区的降水增加使得这些地区变得湿润(即PDSI值较高)。然而,期间欧亚大陆的大多数地区、非洲、加拿大、阿拉斯加、澳大利亚东部在变干,部分原因是这些地区自1950年以后大幅度的地表增温。

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,全球极干( $\text{PDSI} < -3.0$ )地区的面积从12%增加到30%,80年代初由于El Niño引起的降水减少使其面积突增,随后地表增温是主要原因,而极湿地区的面积( $\text{PDSI} > +3.0$ )减少很小。总之,从1950~1972年间,全球极干或极湿地区面积有7%的轻微减少,这主要由降水变化引起;自1970年以来,极干或极湿地区的面积从占全球陆地面积的20%增加到38%,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地表增温引起。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,美国、欧洲、东亚、非洲南部及萨赫尔地区有向更极端发展的趋势,地表增温(增加了空气的水容量从而增加了水分需求)是大范围变干的主要原因。

Palmer模式用简单的方法计算蒸散,没有考虑地表太阳辐射、相对湿度及风速变化的影响(Pen-

man 1948)。1961~1990 年期间,美国、欧洲部分地区及前苏联的地表太阳辐射似乎有所减少(Abakumova 等 1996; Liepert 2002),这经常被认为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或 60 年代初期以来美国、欧洲部分地区、西伯利亚(Peterson 等 1995)、印度(Chattonpadhyay, Hulme 1997)及中国(Liu 等 2004)水面蒸发减少的主要原因。

较干燥地区蒸发皿蒸发量( $E_{pa}$ )与实际蒸散量( $E$ )呈现互补而不是比例关系, $E$  随潜在蒸散增加而增加(与 Palmer 模式一致),却随  $E_{pa}$  增加而减少(Brutsaert, Parlange 1998)。例如,在过去 50 a 中,密西西比河流域云量增加使太阳辐射减少从而蒸发皿蒸发量减少,而实际蒸散由于降水与土壤湿度的增加而增加(Milly, Dunne, 2001)。最近对来自美国与前苏联的蒸发资料(Golubev 等,2001)进行再分析,得出在过去 40 a 中,前苏联南部与美国大部分

地区实际蒸发量有增加趋势。

基于近地表大气水分供给与需求的 PDSI 趋势与温室气体引起全球增暖背景下蒸发增加的结果一致,与综合的气候耦合模式(Cubasch 等,2001; Dai 等,2001)预测相同。20 世纪 70 年代后全球温度上升显著(Folland 等,2001),人类活动使温室气体增加从而引起气候变化(Mitchell 等 2001; Dai 等,2001; Karl, Trenberth 2003)。温度升高增加了大气的水容量从而增加了潜在蒸散量。因此全球变暖不仅使温度升高,而且使近地表变干,如 PDSI 所记录的那样。干旱持续时间的延长、程度加重及范围扩大是直接结果(Trenberth 等,2003),理论上的推測在实现,正如这里及 Nicholls(2004)所讨论的一样。

#### 致谢及参考文献略

译自 *Journal of Hydrometeorology*, 2004 年 12 月, 1117~1130